

政府职能的解释：阿根廷时局动荡分析

[作者] 李丹阳

[单位]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摘要] 本文认为，梅内姆政府实行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使阿根廷获得了经济上的腾飞，但也带来了许多新自由主义本身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21世纪初，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成果的基础上，阿根廷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所谓的“第三次革命”。这次革命的目标要求阿根廷政府适时转变政府职能，着力解决社会问题，推动社会协调发展。但德拉鲁阿政府却没有根据阿根廷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变化适时转变政府职能，最终导致阿根廷出现经济、政治、社会的全面危机。

[关键词] 阿根廷，职能，转变，阶段

哭泣的阿根廷

从2001年12月到2001年1月中旬近一个半月的时间成了拉美大国阿根廷的噩梦，在短时间之内阿根廷这个美丽富饶的国度变成了世界上最动荡不安的地方，整个国家充斥着失业、贫困、骚乱、暴力。历史上的阿根廷是一个资源丰富，充满着财富和希望的国家，20世纪初的时候阿根廷的经济实力一度位居世界第八位。[1]然而，在新世纪开初的第一年结束之际，阿根廷却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困境，成为世界第一大倒帐国，这一衰败历程实在让人瞠目。以下是对这一个半月阿根廷局势的回顾和总结。

2001年12月6日，由于阿根廷的预算赤字没有达到之前的确定目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拒绝向经济衰退已达四年之久的阿根廷提供13亿美元的贷款。这使阿根廷面临其历史上最大的债务危机。为了满足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挽救阿根廷濒临崩溃的经济，经济部长卡瓦略12月17日宣布将大幅削减2002年的预算，公共支出将从490亿美元削减至396亿美元。这一消息再加上一段时间以来实行的限制银行提款和外汇出境的政策加大了阿根廷人民本就沉重的经济负担，不满情绪日益高涨。12月19日，对政府经济政策极度不满的群众冲入各地的超市和商店，大肆抢掠，揭开了阿根廷持续至今的混乱局势序幕。饱受内外压力的以经济部长卡瓦略为首的全体内阁也于当日向当时的总统德拉鲁阿辞职，宣告卡瓦略长期以来的“超级经济权力”最后终结。鉴于国内的混乱局势，总统德拉鲁阿于12月19日夜宣布全国戒严30天，20日他又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但这些措施都无法扭转局势，阿根廷社会已经完全失控。在这种情况下，1999年10月上台的社会民主党人德拉鲁阿不得不于12月20日晚向国会递交了辞呈，结束了他740天的执政。随后，阿根廷的参院临时议长、正义党的雷蒙·普尔塔接替德拉鲁阿职务，并在48小时内主持召开国会两院全体大会，讨论德拉鲁阿的继任人选。

12月23日上午，阿根廷议会经过马拉松式的激烈辩论，最终以169票赞同、138票反对，通过圣路易斯省省长罗德里格斯·萨阿出任代理总统。萨阿上任之后立即推出了他平复社会危机、振兴阿根廷经济的八点计划[2]：(1) 暂停偿还1320亿美元的债务，并用还债资金创造100万个就业机会；(2) 创建一种新货币，以避免比索贬值和阿根廷经济美元化。比索和美元都是阿根廷的合法货币，两者的汇率仍为1:1；(3) 将总统工资缩减一半至每月3000比索(美元)，并将此作为政府职员的月最高工资上限；(4) 拍卖政府汽车和总统专机；(5) 冻结政府机构工作人员的休假；(6) 实施紧急食品计划；(7) 向在上周社会动荡中遭抢或生意受损的店主提供补偿；(8) 将政府部长的职位从10个减至3个，只设内政、外交

和劳工部长三个职位。这些计划起初得到了国内外舆论的一致称赞，甚至有人称之为“萨阿新政”。但由于新政府仍然没有改变前政府实施的限制提款政策，12月28日晚大批示威者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的总统府前举行抗议活动，要求阿根廷过渡政府的主要官员辞职。两天之后，阿根廷过渡政府内阁在国内爆发新一轮骚乱后，全体向临时总统萨阿提出辞职。12月30日，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萨阿由于得不到正义党内部实力派的支持和无法控制国内日益严峻的社会动荡宣布辞职。12月31日，法定全力继承人参议院临时议长普埃尔塔也提出辞职。陷入权力真空的阿根廷只好由阿根廷众议院议长爱德华多·卡马尼奥担当临时总统，直到选出新总统为止。

正义党参议员爱德华多·杜阿尔德2002年1月1日晚在立法大会上当选为阿根廷总统。新政府上任伊始，就决定从汇率制度入手解决阿根廷面临的危机。1月4日，杜阿尔德政府向议会提交了关于改革现行汇率体制等一揽子措施的经济法案，阿根廷众议院在经过十几个小时的辩论后于6日凌晨通过了该项法案，并将其移交参议院审议。参议院6日上午9点30分开始进行辩论，下午6点30分未作修改通过了这项法案。该法案自议会通过并经总统签署之日起正式生效。这项法案主要内容有[3]：放弃实行了11年的本国货币比索与美元的联系汇率制度，实行比索贬值，政府有权通过中央银行确定比索汇率并发行货币；政府将就外债问题与债权银行重新进行谈判；国内部分中小企业和个人的债务、租赁合同和服务业价格，凡以美元签约的均按1：1的比价实行比索化，即改为以比索结算，由此所造成的差额由国家负担；征收石油出口特别税，用以弥补政府因比索贬值而蒙受的经济损失；逐步解冻银行存款，保证归还被冻结的存款，储户在适当的时候可以如数提取存款；国内商业企业不得趁机涨价；冻结工资，90天内禁止解雇职工等。此后，阿根廷政府又于1月10日正式宣布强制冻结美元定期存款及部分比索定期存款。比索贬值直接导致了阿根廷的物价飞涨，政府冻结美元存款的决定更加剧了大众的不满情绪，1月10日晚，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及其他一些城市再次爆发了大规模的敲锅抗议活动。面对经济和社会的压力，总统杜阿尔德14日呼吁全国各个社会阶层参加旨在实现全国和解的“社会对话”，认为国家经济的崩溃已使阿根廷走到“无政府状态和自相残杀的暴力”边缘。阿根廷人民必须团结起来共同克服经济危机。消除贫困和不公正现象、恢复社会的活力是全国对话的最高目标。他还宣布，在解除了经济紧急状态后，阿根廷还应转向更大的目标，其中包括进行体制改革，大幅度削减政治性开支，改组国家机构，提高政府效率和专业化水平。全国的企业家、工人、科学家、艺术家等各阶层人士都有责任参与完成这项使命。

回顾阿根廷这一个半月的历程，可以发现阿根廷的危机不是单一方面的危机，而是社会体制各个层面积聚的问题在外界因素刺激下的总爆发。在这一过程中，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纠缠在一起，使问题异常复杂。任何目前可见的政策措施都可能在解决一方面问题的同时又恶化了另一方面的问题，这直接促使阿根廷出现了在短时间内连续更换5位总统的闹剧。并不是因为这些总统和内阁缺乏治理国家的能力，而是长久以来积累在国家机体里的消极因素综合爆发的威力过大，没有人能够在短时间里完全控制整个社会的局势。对阿根廷危机的评论已经不少，多数认为这是一场由经济危机引发的社会动乱。但在笔者看来，导致阿根廷出现目前混乱局面的最深层根源是20世纪90年代梅内姆实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梅内姆的改革在整体上来说是很成功的，他的一些思路和政策甚至被称为“梅内姆主义”。但到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在国外形势发生深刻变化以及阿根廷国内社会经济发展到更高层次的时候，阿根廷政府却没有适时转换政府职能，没有很好地解决新自由主义改革遗留下的各种问题，才致使这次危机以前所未有的烈度爆发出来。为了能够透过纷繁复杂的具体现象来深入分析阿根廷动荡局势，下面笔者就从梅内姆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出发展开分析。

梅内姆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

上个世纪 80 年代是拉丁美洲“失去的 10 年”。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为了克服危机、振兴本国经济，拉美各国的领导人纷纷寻求新的经济理论来启动他们的经济改革。这时，以货币主义为代表的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跃入了这些领导人的视线。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主张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实行市场化的导向。该学派的基本理论观点是，当代社会的所有弊病是由于资产阶级国家干预过多造成的。[4]（序）其主要的政策性主张有[5]：

1. 使对外贸易实现自由化，这是因为，进口替代或内向发展政策鼓励资源向本国市场倾斜，从而打击了出口；而鼓励出口或外向发展政策则能从世界市场上获得竞争性压力，因此可以扩大技术创新和提高效益；
2. 政府不应干预价格体系，因为未被扭曲的价格能最大限度地促进经济增长；
3. 缩小公共部门的规模，尤其要对生产领域中的大多数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实施私有化的方法可采用以下 3 种：（1）把国有企业的资产出售给私人部门；（2）与私人部门达成协议，允许其提供原来只应该由国家提供的商品和服务；（3）允许私人公司进入由国家垄断的市场。为此，国家应废除有关法规和取消限制私人部门进入市场的障碍。
4. 政府要努力消灭财政赤字，减轻税收负担。
5. 减少政府的调控，尤其要放松对劳动力市场的控制、放开利率、取消对信贷机制的监督和为本国资本及外国资本进入金融市场提供方便。总之，新自由主义思潮强调的是市场和私人资本的作用。

1989 年 7 月，梅内姆接替阿方辛就任总统，他并没有奉庇隆主义为圭臬，而是以实用的态度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其主要目标就是改变过去阿根廷政府一贯坚持的进口替代发展战略，使阿根廷的经济更加深入地融入全球经济，从全球化中得到最大利益。这次改革的主要措施包括：

推出兑换计划，抑制通货膨胀

阿根廷历史上主要依靠发行货币来弥补财政赤字，这往往致使通货膨胀失控，是造成严重经济危机的重要根源，也使得国内生产和社会生活始终不能进入良性运行的轨道。梅内姆上台后，为了抑制多年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率，开始实施兑换计划。兑换计划把阿根廷货币与美元的汇率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而且以国家的外汇和黄金储备为担保，以达到稳定币值、抑制通货膨胀的目的。从 1992 年 1 月起，阿政府用比索（Peso）取代奥斯特拉尔（Austral）作为通用货币，比索可以自由兑换，与美元的固定比价为 1：1。在汇率制度上，阿根廷实行“滑动钉住制”，即钉住美元，但根据情况做出适度调整的汇率制度。与此同时，阿政府还加强对金融的宏观调控，并严格控制货币发行量，以恢复本国货币的支付能力。兑换计划实施后，阿根廷的通胀率由 1990 年的 1300% 下降到 1992 年的 17.5%，1993 年和 1994 年分别为 7.4% 和 4%。[6]

调整财政政策，压缩公共开支

与兑换计划相配套，阿根廷政府开始调整财政政策，其主要内容是，紧缩公共开支，增加税收，实现财政收支平衡。1990 年梅内姆政府签署法令并采取一系列措施，精简庞大的公共机构和紧缩公共开支。与此同时，总统府和卡瓦略领导的经济部联合成立全国公共开支统一规划委员会和国家改革管理检查委员会，专门负责精简机构和压缩公共开支的工作。政府在执行这一政策时态度十分坚决，凡拒绝执行政府有关法令和措施的官员和国营企业领导

人均予以罢免。与此同时，实行“一揽子”紧缩计划，削减政府公共开支 10 亿美元，其中包括减少政府高级官员工资的 15%，减少月薪超过 2000 美元的官员的薪水。这些措施解决了长久以来存在的财政赤字，并出现了盈余，1992 年财政盈余为 31 亿美元，1993 年盈余约 44 亿美元。阿根廷政府支出占 GDP 的比重也由 1985 年的 28% 下降为 1994 年的 17%。[7]

改革税制

为了减少财政赤字，增加收入，梅内姆政府自 1991 年起实施了庞大的“税务工程”。这个工程的主要措施有：第一，改革和统一了公司所得税，取消了超额利润税，对国有企业分配所得的股息收入征收 28% 的所得税，对其它企业征收 20% 的所得税。第二，简化税制，加强管理，将税收重点由直接税转移到间接税上来，提高间接税的比重，扩大增值税的征收范围。简化后的税制具有较高的透明度，纳税人不易钻空子，这对管理和增加税收十分有利。阿根廷政府吸取以前税制改革的经验，在新的一轮改革中，十分重视管理工作，实施新发票制度，采用现代化的电子技术，加强宣传，提高公民的纳税意识，严惩偷税漏税，并以减免税收来鼓励外逃资金回流，有力地促进了税收。第三，降低税率，扩大税基。关于个人所得税，政府原先只对工资或薪金收入征税，这实际上是不公平地对待个人收入和经营收入，造成许多纳税人想方设法将工资或薪金收入冒充股息收入逃避纳税。为了防止偷税漏税，增加政府的税收收入，阿政府决定降低税率，对个人所得税的边际税率由 45% 调到 35%。与此同时，注重扩大税基，增加对个人股息收入的征税，税率为 1%。

实行国有企业私有化

梅内姆执政前，阿根廷国营企业在国家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1988 年全国最大的 200 家企业的营业额中，国营企业占 30%。这些企业日益失去活力，年赤字达 20 亿美元以上。1989 年，梅内姆上台后，为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转型、提高阿产品国际竞争能力，推动国内产业向国际市场靠拢，采取坚决果断措施对国营企业私有化。阿根廷政府在 1989 年的《国家改革法》中，非常明确地规定了可以进行私有化和出租的国有企业。根据这项法律，政府制定了新的国有企业改革计划。新的改革计划将公益服务部门（电讯、电力）、铁路和石油部门列入改革对象，从而极大地扩大了私有化的范围。阿根廷政府首先于 1990 年对一些公共服务业企业实行了私有化，后来于 1992 年出售了天然气和电力服务业，1993 年出售了占国有企业总产值将近 25% 的石油矿藏管理局和钢铁企业。[8]从 1995 年开始，政府还把军工、石油化工、水力发电等方面的公司转到私营部门。阿根廷把国有企业私有化视为建立自由市场和对外开放型经济的突破口和国家经济良性运行的基础，在短短几年内，向私人资本拍卖了大部分国有企业。在拉美，阿根廷是实行私有化最快的国家之一，以致有人惊呼阿根廷政府把整个国家都卖了。

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外资

梅内姆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首先遇到的就是资金问题，尽管阿根廷已经有了一定规模的工业和发达的农业，但缺乏能够支撑国家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巨额金融资本。这一方面是因为伊比利亚文化传统对银行储蓄率的影响，另一方面也由于阿根廷过去采用的内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对外资的阻隔。因此，梅内姆上台之后，为了改善投资环境，阿根廷政府修改和重

新制定了有关政策、法规，鼓励外国投资者扩大投资。

首先，阿根廷政府于 1989 年对外贸法作了修改，简化投资审批手续，实行自动批准制度，从而使外国投资者到阿根廷的投资更加便利。同时，外国投资者的利润汇出也没有任何限制，但如果 1 年内汇出利润超过登记资本的 12%，他们就得交纳 15—20% 的税。如果投资时未做特殊规定，投资者调回资金的期限一般为 3 年，投资返还可以受用现金或以美元计值的 Bonex 证券。

其次，拓宽外国投资领域。阿根廷政府规定，除具有广泛影响的宣传工具（指报纸、广播、电视等）外，其它各部门都对外开放，甚至在国防工业私有化时，外国投资者也可投资。尽管“债务与股份交换”计划已经中止，但投资者仍可根据具体情况逐一谈判购买私人企业或已经私有化了的国营公司。跨国公司母、子公司间的贷款可视为独立实体间的债权债务关系。阿根廷还与许多国家签有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对方投资提供法律保障。梅内姆政府积极推进全方位经济开放政策，修改外资法，规定对外资和民族资本平等对待，鼓励外国投资。

从 1991 年到 1994 年，先后有 3500 家外国企业到阿根廷投资。外资总额 1991 年为 24 亿美元，1992 年又采取了新措施，致使当年就吸引外资达 41 亿美元，已跻身于世界上吸引外资最多的 10 个国家的行列。1993 年外资继续增长到 117 亿美元，1994 年达 180 亿美元。外资中美国资本占第一位，其次为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瑞士、荷兰等。外国在阿投资已占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22%。

梅内姆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使阿根廷从“失去的十年”的阴影中逐渐走了出来，并且改变了阿根廷传统的社会经济模式，实现了内向型发展道路向外向型发展道路的转变，使阿根廷经济与世界经济更加紧密地融合在一起。从 1990 年到 1994 年，阿根廷经济增长超过了 30%，仅次于中国和泰国，居于第三位。[9]（P17—18）但是，任何事物都有其利弊，新自由主义政策“导致的经济后果在每个地方都是一样的，正如人们所料：导致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加剧，世界上最贫困国家和人民被掠夺得愈加严重，全球环境灾难化，全球经济不稳定，以及富人财富获得前所未有的暴涨。”[10]（P2）改革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阿根廷经济发展方面的问题，但却对伴随改革而来的各种社会问题束手无策。这些问题包括：（1）失业率居高不下，根据拉美经委会 1999 年对拉美地区 19 个国家进行的统计，阿根廷的失业情况属于程度严重的 7 个国家之一，为 14.5%；[11]（P340）（2）收入分配严重不公，美洲开发银行编撰的《拉美面临着不平等》一书的统计中显示，1996 年阿根廷与巴哈马、哥斯达黎加、委内瑞拉、秘鲁、哥伦比亚的基尼系数同处于 0.45-0.50 的区间，属于大大超过分配不公“很严重”的程度；[11]（P342）（3）社会贫困化加剧，梅内姆十年经济改革成效显著，但是也遗留下不少社会问题，特别是贫困人口大幅增加，失业人口上升了 146%。[12]上述三种严重的社会问题致使阿根廷的社会脆弱性进一步加重，这种脆弱性表现在人们对劳动力市场的变化、社会服务的削减、传统民意表达和社会组织形式的削弱的承受能力上。[13]在阿根廷，不单是那些失业和处于贫困状态的人感到失望无助，就连一部分中等阶层越来越强烈地感到“不可靠、不能保护自己和有风险”。所有这些都表明，倡导削减国家职能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在带来经济发展之后，已经不能很好地解决阿根廷新的发展阶段所面临的问题。

第三次革命与政府职能转变

学者们在分析这次阿根廷时局动荡的原因时，多归咎于外部的世界经济大环境以及内部的汇率制度等等经济性原因。还有一些分析则把阿根廷今天的糟糕局面完全归结为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恶果。无可否认，经济上的问题是导致阿根廷时局动荡的重要原因和导火线。但这次时局动荡非常明显地反映出在阿根廷社会内部存在着极为复杂的深层次矛盾。笔者认为，在这些矛盾中，最为根本的是阿根廷政府的职能与阿根廷社会需求之间的脱节，换句话说，

即导致这次阿根廷时局动荡的重要原因在于阿根廷政府没有根据国内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变化而适时转换政府职能。

曾在梅内姆政府中担任战略计划国务秘书的豪尔赫·卡斯特罗 (J. Castro) 博士在梅内姆总统行将卸任的 1998 年撰写了《第三次革命》一书。该书对阿根廷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回顾,并对阿根廷的未来发展提出了展望和预测。卡斯特罗博士认为,1945-1955 年庇隆所进行的广泛的社会改革是阿根廷历史上第一次革命,20 世纪 90 年代梅内姆开展的结构性经济改革是第二次革命。为了实现阿根廷未来的长远发展,要求阿根廷必须在上述两次革命的成果基础上实行第三次革命。他认为,这次革命的目标是:对付并解决失业问题、贫困问题和社会边缘化问题,使得新的经济体制和新的国际参与带来的好处能造福于全体阿根廷人。[14] (序)第三次革命有这样八个基本点[14] (P194—196):(1) 承认全球化的结构现实,即全球化是一个现实,而不是全球化思想;(2) 认为 90 年代所进行的改革,特别是根据世界趋势建立的经济体制和所制定的使国家重新参与国际事务的结盟政策,使阿根廷登上新的比过去高得多的历史台阶,使阿根廷能对付和解决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尤其是被认为是新历史阶段重点要解决的社会挑战;(3) 确认在食品革命中,根据阿根廷的潜力,阿根廷是世界农业食品贸易的头等主角;(4) 自豪地恢复纯洁和完美的民族主义;(5) 提出重新确定阿根廷经济地理;(6) 通过加紧开发其竞争优势,重新估价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的重要性;(7) 进行一场教育和劳工革命,促进社会集体自我教育的广泛进程;(8) 进行深刻的体制改革。

阿根廷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在新自由主义改革的过程中受到了相当大的削弱,基本从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退了出来。梅内姆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阿根廷经济发展的问题,但却留下许多实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所必然造成的各种社会问题。因此,阿根廷在经历了 90 年代经济高速发展之后就进入了第三次革命阶段,即以解决各种严重影响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社会问题为核心,走一条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道路。“在自由化的经济环境中,政府必须发挥新作用,开展新的业务。”[15] (P153) 这次革命首先要求阿根廷政府把注意力转移到社会层面上来,进而,在减少对经济的国家干预的同时必须增强政府解决社会问题、协调社会矛盾的职能,实现从“经济型政府”向“社会型政府”的转变。这包括以下两个核心职能的转变(提升):(1) 在解决失业问题上,从教育维持型职能向教育创新型职能转变。阿根廷的失业率这几年始终居高不下,直接导致了社会中弥漫着不满情绪,并对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造成严重威胁。失业率高企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在于阿根廷的人力资本已经不能适应世界经济的结构性转变。虽然阿根廷的教育水平在拉美甚至在全世界都算较高的,但政府在这方面的职能还是局限于维持旧有的教育模式,欠缺对世界最新教育模式的了解和借鉴。这导致阿根廷的教育系统不能及时向阿根廷青年提供最新的知识和技术,不能为知识结构已经落后于世界发展的在职人员提供更新培训,使阿根廷相当大比率的群众面临结构性失业的威胁。因此,阿根廷政府应该提升教育职能,使之具有灵活性和警觉性,能够为广大民众提供创新性的知识和技术,而不至于在新一轮竞争中落败。(2) 在解决社会价值分化问题上,从强制整合型职能向理念推广型职能转变。在学者们解读东亚经济奇迹的时候,其中一条经验就是所谓的“东亚价值观”,这种价值观的核心是儒家的传统价值。东亚各国的政府正是用儒家的传统价值来整合社会,使社会各个层面都能聚集在现代化的目标下努力前进,从而为经济的发展创造出稳定的社会环境。反观阿根廷社会,新自由主义释放了政治和思想上的空间,加上伊比利亚文化的熏陶使阿根廷的社会价值领域呈现出异常多元化的局面。一直以来,阿根廷的正义党以庇隆主义作为一种社会价值整合的工具,但在新的形势下庇隆主义由于其自身不可改变的局限性已经失去了它曾经有过的光环。阿根廷发展方略的几次摇摆、政坛活动的激烈斗争、社会公众的抗议活动此起彼伏都从不同侧面反映出庇隆主义在整合社会价值能力上的弱化。因此,阿根廷政府应该抛弃过去的强制整合型职能,转向理念推广型职能。这是指在民主制度的框架下,政府在对本国社会经济情况进

行科学判断的基础上通过推出一种社会发展的价值理念来达到社会价值的归合。就阿根廷目前的情况而言,可以着重推广“第三次革命”的理念,使政府和民众的价值观念统一到建立经济、社会协调并行的社会发展模式上。

然而,遗憾的是,德拉鲁阿继任总统后关注的问题仍然主要集中在如何坚持梅内姆时期的可兑换计划上,对自己在竞选纲领中提出的解决社会问题、打击腐败等承诺却没有付诸实施,更没有从根本上转换政府职能来适应阿根廷社会发展新阶段的要求。此时又恰逢 911 后世界经济不景和阿根廷本国还债周期的到来,以致出现前述混乱不堪的局面。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阿根廷危机的真正根源在于其政府职能没有因应本国发展阶段的改变而及时转变。综观阿根廷危机,可以得出这样两点结论:(1)政府职能必须紧跟本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实现阶段性的转变和提升。政府职能不是固定的、一成不变的稳态结构,一个社会在某一发展阶段上都有其阶段性的特殊要求,政府职能必须及时转变才能切合社会的需要,避免危机的出现。(2)社会的整体协调发展需要“能政府”,政府的作用依然不容忽视。尽管阿根廷的经济水平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但就其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而言仍然属于赶超型经济。这要求政府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在自身公共行政能力提升的基础上引导社会经济的良性发展。但是,与这种现实要求相反,阿根廷政府受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不仅削弱了政府在经济领域的职能,还同时弱化了政府的社会职能。政府职能的全面退缩导致阿根廷政府成为实际上的“弱”政府,难以促进本国经济和社会健康协调发展。职能上的缺位和政府能力上的软弱造成了危急状态下的政府信用危机。当阿根廷政府在民众心目中失去了信用,它所颁布的各种经济社会政策得不到广泛支持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参考文献

- [1] 从世界第 8 经济强国到负债千亿美元——阿根廷衰退之路. 环球时报, 2002—01—10
- [2] 阿根廷代总统宣布拯救国家经济计划八项要点. 新华网, 2001—12—24
- [3] 阿根廷议会通过经济改革法案放弃现行经济模式. 新华网, 2002—01—07
- [4] [法]亨利·勒帕日. 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M]. 李燕生译, 王文融校.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5
- [5] 江时学. 论拉美国家的经济改革[J]. 太平洋学报. 1994, (1)
- [6] 晓章. 阿根廷的经济改革与中阿关系[J]. 拉丁美洲研究. 1995, (6)
- [7] [玻]弗里德里希·J·韦尔施 何塞·V·卡拉斯格罗. 对拉丁美洲国家改革的评论[J]. 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 2001, (1)
- [8] 白凤森. 智利、墨西哥和阿根廷的国有企业改革[J]. 拉丁美洲研究. 2000, (3)
- [9] [智]亚历克斯·E·费尔南德斯·希尔贝尔托[比]安德烈·莫门. 发展中国家的自由化[C]. 陈江生译.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0
- [10] [美]诺姆·乔姆斯基. 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M]. 徐海铭、季海宏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0
- [11] 李明德.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发展报告(2000—2001年)[C].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 [12] 宋晓平. 阿根廷经济政治形势述评[J]. 拉丁美洲研究. 2000, (2)
- [13] 白凤森. 近年来的拉美社会形势[J]. 拉丁美洲研究. 2001, (1)
- [14] [阿]卡斯特罗(J. Castro). 第三次革命[M]. 徐世澄译.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9
- [15] 李明德、江时学. 现代化: 拉美和东亚的发展模式[C].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http://www.pssw.net/essays.asp?id=206>